

# 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应用

邢嘉锋 编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是2017年江南大学重点项目“以‘学习产出’为导向的  
大学英语翻译课程体系的构建与探索”的部分成果

(项目批准号: JG2017038)

# 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应用

邢嘉锋 编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应用/邢嘉锋编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672-2660-9

I. ①认… II. ①邢… III. ①认知语言学-翻译学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3884 号

书 名: 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应用

---

编 著 者: 邢嘉锋

责任编辑: 沈 琴

装帧设计: 刘 俊

---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 箱: sdcbs@suda.edu.cn

印 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7481020

---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6 字数: 164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660-9

定 价: 29.00 元

---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7481020



## PREFACE / 前言

从译作到译者、从成品到过程的转向，译者的翻译认知心理过程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翻译过程研究是描写性翻译研究的三大取向之一，涉及译者的心理活动，而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这个“黑匣子”的活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问题。因此，翻译过程研究的进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为了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和译者大脑的运作过程，研究者将认知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引入翻译研究，这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模型，也为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和更具可操作性的数据收集方法。

翻译学与认知科学的结合促成了翻译认知研究或称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这一交叉学科的诞生。根据 Shreve 和 Angelone 所做的论述，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Shreve & Angelone 2010）

近年来，国内外翻译认知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较为瞩目的研究成果。（邓志辉 2011）Lörscher, Gutt, Danks et al., Olohan, Tirkonen-Conditt & Jääskeläinen, Alves, Göpferich et al., Shreve & Angelone, O'Brien 等发表了有影响的专著或论文。王寅、王斌、肖坤学、谭业升、卢卫中、王福祥、颜林海、金胜昔、林正军等从不同角度对认知翻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成果丰硕。可以说，认知翻译学的研究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本书对认知翻译学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全书由五

章组成。

第一章为概述。重点从翻译研究的传统、翻译研究的发展和传统翻译观的不足之处等方面对翻译研究与认知的渊源进行了论述，指出在跨学科背景下翻译研究开始认知转向。

第二章梳理了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指出认知翻译学以认知语用学（关联理论、顺应论）、认知语言学（含认知语义的隐喻、转喻、范畴化，认知语法的识解、突显原则与原型理论、认知参照点）、构式语法等为理论基础。本章还对翻译认知研究中的信息加工范式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探究了认知翻译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翻译学借助语言学、文论、哲学理论等不断丰富自身，建构了多种翻译理论，近几十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翻译研究又有了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本章从实证主义范式、自然主义范式和量化、质性研究方法几个方面探索翻译学的研究方法。

第四章是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从翻译批评、生态翻译学、认知翻译学对翻译教学的启示三个方面对认知翻译学的实践状况进行了总结。越来越多的翻译批评研究开始重视对译者主体的考察，即从认知角度进行翻译批评。认知翻译学对翻译能力培养、翻译教学的课堂方式选择和教材的编写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是结语。本章主要对认知翻译研究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并从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三方面对认知翻译学研究进行了展望。国内认知翻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本人得到了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严敏芬教授的鼓励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本书还得到了江南大学校级重点项目的资助。本书的出版



亦得到了此项目的经费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使已过不惑之年的我能够全心地投入本书的编写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大量书刊和业界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各方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纰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予以指正。

邢嘉锋

2018年夏于江南大学小蠡湖畔



# CONTENTS / 目 录

## ■ 第一章 概述 / 1

- 1.1 翻译研究与认知的渊源 ..... 1
  - 1.1.1 翻译研究的传统 ..... 1
  - 1.1.2 翻译研究的发展 ..... 2
  - 1.1.3 传统翻译观的不足 ..... 5
- 1.2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 7
  - 1.2.1 认知和翻译的关联 ..... 12
  - 1.2.2 认知翻译学的产生 ..... 14
  - 1.2.3 认知翻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17
  - 1.2.4 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方法 ..... 21

## ■ 第二章 认知翻译学：理论 ..... 22

- 2.1 理解认知翻译学 ..... 23
  - 2.1.1 认知翻译学的定义 ..... 23
  - 2.1.2 认知翻译学的本质 ..... 23
- 2.2 认知翻译学理论取向 ..... 25
  - 2.2.1 认知翻译与语用学理论 ..... 25
  - 2.2.2 认知翻译与认知语言学 ..... 30

2.2.3	认知翻译与信息加工 .....	62
2.3	翻译的认知模型 .....	69
2.3.1	三重互动体验 .....	70
2.3.2	视源语作品和译语作品为复杂构式 .....	72
2.4	翻译认知加工 .....	73
2.4.1	翻译认知加工单位 .....	73
2.4.2	翻译认知加工步骤 .....	74
■	第三章 认知翻译学：范式与方法 .....	76
3.1	认知翻译学研究范式 .....	78
3.1.1	实证主义范式 .....	78
3.1.2	自然主义范式 .....	79
3.2	认知翻译学研究方法 .....	79
3.2.1	量化研究方法 .....	80
3.2.2	质性研究方法 .....	87
■	第四章 认知翻译学研究：应用 .....	93
4.1	认知翻译学视野下的翻译批评 .....	94
4.1.1	认知翻译批评三要素 .....	98
4.1.2	认知翻译批评五步模式 .....	100
4.2	生态翻译学 .....	103
4.2.1	生态学范式与认知翻译学研究 .....	104
4.2.2	生态学认知翻译学研究方法 .....	107
4.2.3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意义 .....	110
4.3	认知翻译学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112





4.3.1	认知翻译学和翻译教学 .....	113
4.3.2	翻译能力：翻译课堂的具体目标 .....	118
4.3.3	当前翻译教学中翻译能力培养的缺失 .....	124
4.3.4	译者的翻译能力和认知活动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	129
4.3.5	认知翻译学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启示 .....	133
■	第五章 结语 .....	137
5.1	认知翻译学研究的优势与不足 .....	138
5.1.1	认知翻译学研究的优势 .....	138
5.1.2	认知翻译学研究的不足 .....	139
5.2	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展望 .....	144
5.2.1	研究理论 .....	144
5.2.2	研究方法 .....	144
5.2.3	研究对象 .....	145
■	参考文献 .....	147

## 图表(图)

图 1.1	关于认知翻译的文章发表年份分布	11
图 1.2	关于认知翻译的各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情况	11
图 1.3	关于认知翻译的文章发表学科分布	12
图 1.4	翻译过程中的认知	15
图 1.5	认知翻译观	16
图 2.1	顺应论对翻译活动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29
图 2.2	认知参照点模型	47
图 2.3	认知翻译模式	69
图 4.1	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基本图示	98
图 4.2	认知翻译批评的功能模式	103
图 4.3	以认知翻译学为指导的动态教学模式	126

## 图表(表)

表 4.1	认知主体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	99
表 4.2	翻译过程中的 ICM	117
表 4.3	学生在翻译过程中的 CM	117



# 第一章

## 概 述

### 1.1 翻译研究与认知的渊源

#### 1.1.1 翻译研究的传统

翻译是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对我国的学者而言，尤其要注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季羨林先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译。”（许钧 1998）毫无疑问，人类的进步，离不开译者积极的翻译实践。而翻译研究较之于翻译实践，其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翻译理论研究和探讨翻译固有的内在规律，发现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研究翻译理论，可为翻译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提供某些解决的办法。换言之，翻译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用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翻译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I. A. 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过，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地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并且有所创新。

然而，长期以来，译论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这不说明翻译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的《绪论》中阐述了译论的三个职能：认知职能，也就是翻译理论的启蒙作用；执行职能，也就是翻译的能动性和实践性；校正职能，也就是翻译理论的规范性和指导性。（刘宓庆 2003：2—3）这些观点在为翻译理论正名的同时，也为翻译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 1.1.2 翻译研究的发展

语言是人类沟通思想、交流文化的工具。综观整个人类历史，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无论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只要语言文字不同，就离不开翻译。翻译的历史，从人类使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中国是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翻译历史。季羨林曾言：“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季羨林 2007：8）

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王宏印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肇始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直觉阶段。（王宏印 2003：221）如果按照中国文化的社会历史分期，又可分为古代部分、近现代部分、当代部分。其中，古代部分对应于肇始阶段，近现代部分对应于古典阶段和玄思阶段，而当代部分则对应于直觉阶段。

始于东汉止于宋朝的佛经翻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翻译高潮。这一时期，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形成了关于佛经翻译的初步的理论探讨，被称为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的肇始阶段。（王宏印 2003）其中最重要的译论包括：支谦的《法句经序》，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西方辞体”论，慧远的“厥中”论，彦琮的“八备”说，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六例”，等等。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理论虽然语焉不详，



条目众多，但基本涵盖了翻译的方方面面，涉及本体论、主体论、文本论、方法论等诸多问题。而且，从一开始这些译论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与我国传统文论息息相通，为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划定了方向。

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各色思想文化潮流的涌入，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保种，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尽艰辛的征程。在这样一个双向流动的历史进程中，翻译活动日益频繁，翻译理论的探索也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这一阶段被称为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的古典阶段。该阶段“以借鉴中国传统修辞写作理论和西方语言学理论为主体，试图找到和建立中国译论的基本思路”（王宏印 2003：221）。这一阶段虽然“理论化和操作化倾向均较前为甚，有制订翻译规则之企图”（王宏印 2003：221），可仍是对前阶段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是严复基于传统写作理论的“信、达、雅”三字诀。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罗新璋，陈应年 2009：202）“信、达、雅”在作为“译事楷模”的同时亦是“文章正轨”。由此可见，严复确实是用传统文论来论述翻译，把翻译当作“文章”来经营的，尤其是“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明确宣示了翻译是要作传世之文。

到了民国时期，文坛和译坛人才辈出，这是我国译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以借鉴哲学原理介入翻译理论的研究，或者把翻译问题哲学化，以求解决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企图建立翻译的哲学基础”（王宏印 2003：221）。这一阶段因此也被称为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的玄思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包括胡以鲁、容挺公、章士钊和朱自清关于译名“音译”和“义译”问题的论争，贺麟关于翻译可能性的论证，以及金岳霖论“译意”与“译味”。他们主要围绕翻译是否可能或可译性问题进行哲学化思辨，论题并没有

超出传统文论范畴。例如，贺麟曾针对“言意之辨”的传统思维模式进行反驳。他认为：“言虽不能尽意，言却可以表意。文虽不能尽道，文却可以载道。盖言为心之声，亦即言为意之形。……意与言道与文是体与用、一与多的关系。言所以宣意，文所以载道。意与言，道与文之间是一种体用合一，而不可分的关系。故意之真妄，道之深浅，皆可于表达此意与道的语言文字中验之。”（罗新璋，陈应年 2009：518）

传统译论发展到当代，其显著特征是译论与国学密切结合，不仅从传统文论入手论翻译，更从国学各方面论述翻译。王宏印称这一阶段为直觉阶段，认为“（该阶段）以回归中国传统文艺学的直觉思维方法为理论源泉和思辨特征，尤其注重借鉴语源学资料和关注语言问题，名义上试图融合东西之学，实际上乃是回归国学的根本”（王宏印 2003：221）。笔者认为“回归”二字或许不恰当，传统译论的发展一脉相承，一直以来并未跳出国学范畴，只是这一阶段在论及意境、形神、风格等问题时，将国学的“诗论”“画论”“书论”等移植到翻译理论构建中，其核心仍是围绕翻译转换问题，把标准和方法融为一体，且侧重于文学翻译本质的讨论。

该阶段最重要的理论包括钱锺书的“化境”说和傅雷的“神似”说。以傅雷的“神似”说为例。傅雷早年曾在巴黎大学专攻艺术理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当他作为翻译家论及翻译时，以“画论”述翻译，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观点。他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罗新璋，陈应年 2009：623）

傅雷的翻译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选材要符合社会发展及读者的需要；其次，翻译只有忠实于原著了才能忠实于读者；最后，表达要传神达意。在傅雷看来，好的译文读起来就像是作者本来就是用汉语写的一样，看不出有翻译的痕迹，言辞、意义甚至文章的气质都与原文相同。但傅雷提出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不是要置形式于



不顾，更不是主张不要形式，而是神依附于形，形神一体。

钱锺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说主要源自对林纾译文的评价。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才算入了化境。钱锺书的翻译标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译文通顺，读起来不像译文；二是保留原作精髓，使译文不走样、不失真。他认为翻译的功能在于贯通中西，达到不隔的状态。因此，换个角度讲，钱锺书提出的“化境”不是翻译的标准，而是翻译的最高境界。

### 1.1.3 传统翻译观的不足

传统翻译理论虽然历史悠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具有多方面的历史局限性。

#### 1. 对翻译的重视低于原作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认识论上有缺陷，长期以来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导致翻译理论探讨在一千多年中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发展相当缓慢。比如，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一向都重视原作，将译文看作原著的附庸，而非译者的再创作。传统观念认为翻译是一种模仿，是缺乏创造的产品，文化价值远低于原创作品。尽管翻译是作者的再创造，有很高的艺术性，也是我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传统文化界及大部分学者并不重视翻译研究。

#### 2. 研究对象相对狭窄，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缺少基本的翻译理论体系

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方法陈旧而又难以改变。中国文化中意识形态的保守决定了翻译研究系统的滞后，中国翻译研究的中心至今仍停留在应用研究的层次。换句话说，传统翻译理论家多将注意力放在翻译的语言层面，即直译与意译的方法，译者的语言能力与技巧，等等。研究对象仅限于翻译活动本身，而且研究仅集中在语言文化这个

体系内，只关心译文的文学性和选词造句的问题。从东汉开始，中国在近两千年的翻译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传统的分析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以翻译实践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翻译的标准和原则。传统翻译理论的薄弱之处在于古典和近代译论家通常局限于传统文艺美学的方法论，注重宏观描述而缺乏对译作和翻译过程的微观剖析，并且对许多价值观念都未予以科学系统的界定。

传统翻译理论的主观性、模糊性和印象性太强，翻译理论家们常常各抒己见，内容过于空泛。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形式，翻译界常常陷于诠释性的相互争论之中。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概念和标准各持己见，论者和译者往往无所适从，致使翻译理论缺乏本应具有的实践意义。

综上，传统的翻译带有明显的封闭性，严重制约了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且传统的翻译缺少系统的翻译理论，只是以点带面，将某些基于经验和语言分析的论断泛化，这也不利于我国翻译水平的总体提高。

### 3. 强调总体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缺少分析和科学论证

中国的翻译理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主要围绕是否同原著相似的角度展开研究，以归化翻译为主，因而强调总体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中国翻译研究对象的狭窄性，也导致提出的观点都是经验式的随笔文章，缺少分析和科学论证。

传统翻译理论历史悠久，虽然它们具有多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们依然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视若珍宝，矢志于阐发和开拓性继承。我们既要尊重翻译技巧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又要反对把对翻译技巧的探索看作翻译研究的全部；同时，我们既不能忽视作者和原作在翻译中应有的地位，又要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性的一面和读者视野对翻译的作用。此外，我们不仅要正视语言在翻译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又要跳出语言转换的单一视界。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的学术与思维传统重技轻道，即讲究理论的





实用性而疏于细致论证。西方翻译理论则与之相反。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翻译就有了理论和学科意识，从而进入了翻译研究的理性发展阶段，一大批翻译理论家自觉地将翻译理论融入翻译批评的研究。目前，传统翻译理论研究者亟须改变思维方式，立足于中国翻译实际，同时吸取西方翻译理论的精华，发展自身的优势，力争形成原创性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翻译研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优势和长处，弥补中国翻译理论的不足，从而为创建符合中国翻译现状的理论构架打好基础，已经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当务之急。

## 1.2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20 世纪以来，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与技术的融合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这使科学更加变成了一项社会综合事业和工程，以至于不通过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突破。学者克莱恩指出：“边界跨越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明确特征。”（熊沐清 2013：15）这种跨越的呈现方式就是“界面研究”。

董洪川（2012：3）认为：“外语学科的‘界面研究’至少应该包含两个重要的向度：一是外语学科内部的‘界面研究’，即在外语（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外语）学科的不同领域之间展开‘跨界研究’，譬如语言与文学、语言与翻译、语言与文化、文学与翻译等；二是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跨界研究’，譬如语言与认知科学、语言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科学、语言与科学、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环境学等。”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译学出现从译作到译者、从成品到过程的转向，翻译界开始引入认知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从而实现“跨界研究”。这种跨界作业可以打破学科之间